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王维与李白隐逸思想比较研究

科目编号: ULSZ 3078

学生姓名: 李沁颖

学位名称: 文学士 (荣誉) 学位

指导老师: 林志敏 师

呈交日期: 2014 年 4 月 4 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 (中文) 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及原因	1
第二节 研究范围及方法	2
第三节 研究难题	3
第四节 前人研究	3
第五节 研究价值	4
第二章 隐逸原型与盛唐隐逸风尚	5
第一节 隐逸原型与政治	5
第二节 盛唐的隐逸风尚	8
第三章 隐逸经历	11
第一节 王维的隐逸经历	11
第二节 李白的隐逸经历	14
第四章 隐逸生活比较	17

第一节 内倾与外扬	17
第二节 恬淡闲逸与放荡不羁	19
第五章 隐逸原因比较.....	24
第一节 以隐待仕	24
第二节 现实所迫	30
第六章 心灵旨归.....	36
第一节 世乱后的心灵旨归	36
第二节 儒与释道	40
结论	45
参考文献	46
第一节 引用书目	46
第二节 学术论文	48

王维与李白隐逸思想比较研究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11ALB01964

日期：4-4-2014

摘要

隐士的出现往往是为了避开动荡和黑暗的时局，比如著名的隐士庄子就是生活在社会秩序混乱的战国时代。盛唐是一个充满勃勃生机的年代，国力强盛，政治相对清明。可是，这时候出现的两名大诗人王维和李白却都有过隐逸的经历。而王维长期居官却时时思慕着隐逸，李白隐居却时时想着要当官。本论文将通过比较二人的隐逸思想以探究这种矛盾的隐逸现象背后的决定性因素。

论文的第一章绪论将阐述此论文的研究动机、范围、方法、遇到的难题，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此论文的研究价值。

论文的第二章将阐述隐逸原型与政治的关系以厘清隐逸的概念并概述盛唐的隐逸风尚。

论文的第三章，笔者对王维及李白的隐逸经历进行一番梳理，以勾画出他们隐逸的基本轮廓作为比较的前提。

论文的第四章，笔者从隐逸的表层现象——隐逸生活入手对王维及李白进行比较，总结出王维的隐逸特质为内倾及闲逸恬淡，李白则外扬及放荡不羁。

论文的第五章则分从“以隐待仕”及“现实所迫”两点进行比较并深入探讨王维和李白的隐逸原因。

论文的第六章分别从安史之乱后王维和李白的心旨归及他们所接受的儒释道思想进行比较并挖掘出影响他们隐逸形态的关键因素。

研究得出王维和李白的隐逸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他们的心灵旨归还是在“出仕”。这与他们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关，佛教和道教并非将他们导向隐逸的因素。他们的隐逸是以退为进，这种隐逸现象乃是盛唐积极进取之风的产物。

致谢

终于完成了这篇论文，这是令我欣慰的。几个星期以前我甚至还对自己能否定时交出论文产生怀疑，这下终于可以放下心中大石。回想这一路走来，要是只有我在孤军作战，恐怕我现在已经战死沙场了。要感谢的人很多，在此一一致谢。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林老师。要是没有他的鼓励及指导，我现在也交不出一篇完整的论文。每一次当我写论文遇到瓶颈而倍感压力的时候，老师总能在言语中消除我的焦虑并启发我一些新的想法。谢谢老师。

还有我要感谢所有陪伴在我身边的朋友。写论文总有灰心丧志的时候，是他们的加油打气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持，让我坚定地走到了这里。在此我要说，朋友们，谢啦！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这个学期可能是知道我在赶论文，所以很少联络我。实习期间和假期时，父亲常劝我写论文不要临时抱佛脚。父亲的叮咛我时刻在心。我要在此向他们说声对不起，因为忙碌少了联络。谢谢爸妈的体贴，我会顺利地将毕业证书领回来。

最后的最后，我要感恩这个折磨了我一个学期的论文。正如林老师所说，写论文是认识自己、面对自我的过程。论文让我成长了不少。虽然辛苦，收获却是满满的。

第一章 绪论

隐逸与出仕是两个对立的概念。自古以来，仕与隐一直是困扰着士人的两难抉择。隐逸行为并不等同于隐逸思想。拥有隐逸思想的士人未必有隐逸行为。隐逸思想指的是士人对隐逸的倾向性、心态、看法等。处于盛唐的王维和李白都有过隐逸的经历。

第一节 研究动机及原因

王维和李白都是盛唐享负盛名的两个诗人，两人年龄相若，并且在王维去世后的一年李白也相继过世了。他们经历了相同的年代，结交过同样的人：杜甫、孟浩然等，奇怪的是这两人却从来没有交集。最耐人寻味的是他们的隐逸形态。王维做着官却时时向往着隐逸，李白隐居在外却时时大喊着要“济苍生”。一个是想隐逸的官员，一个是想做官的隐者，角色与倾向明显的不协调。仕与隐这两个对立的倾向居然是共存在他们的身上的。笔者想要通过比较王维和李白的隐逸思想来挖掘这个矛盾现象背后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节 研究范围及方法

本论文的命题为〈王维与李白隐逸思想比较研究〉，故研究范围锁定在王维、李白及他们的隐逸诗上。笔者主要采用了文本细读、史传研究和文史互参这三个方法进行研究：

一、传记研究法

由于隐逸思想是随着士人的际遇不断在变化的，把握住士人的生名轨迹是很重要的。在进入比较之前，笔者根据史传整理出“第一章 隐逸经历”。笔者选用的材料包括《新唐书》、《旧唐书》、安旗编的《李白年谱》及陈铁民的《王维年谱》。

二、文本细读

由于这是关乎研究对象思想的研究，文本是作者思想感情的反映，文本细读是必不可少。在“第三章 隐逸生活比较”中，笔者筛选了能够反映研究对象生活的诗进行细读并分析出他们的生活形态。笔者选择了比较可靠的诗集版本，瞿蜕园、朱金成校注的《李白集校注》及陈铁民校注的《王维集校注》。

三、文献互参

在“第五章 隐逸原因比较”及第六章“第一节 安史之乱后的心灵旨归”，笔者将诗文和作者的生平遭遇摆在一起互相参照来分析作者的心态变化。

第三节 研究难题

在写这篇论文时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梳理隐逸经历。尤其是王维的隐逸经历，在梳理的过程中笔者发现王维的第一次隐逸和第二次隐逸的发生时间和地点存在争议。因此笔者花了一番时间来比对各家学者的说法来选出最合理的。

其次，笔者在写“第五章 隐逸原因”的时候本来是想把第六章“第一节 安史之乱后看心灵旨归”纳入隐逸原因部分的。因为隐逸原因的分析是按着时序进行，自然会承接到安史之乱的部分。可是原因和心灵旨归统和在一起还是很奇怪。经过与论文指导老师讨论后，笔者决定另辟新的章节来讨论“心灵旨归”。

第四节 前人研究

关于李白隐逸的课题，学者葛景春在论文〈李白与唐代的隐逸之风〉中将李白放在唐代的隐逸风气下进行考察，并从李白的经历、心理状态和对历代隐者的态度来分析李白的隐逸。学者斐斐在其《李白十论》的〈论李白的隐逸〉一文中从人生经历、对历代隐家的态度和功成身退这三方面来分析李白的隐逸思想。学者袁媛在其硕士论文中〈李白诗文中的“仕”与“隐”〉谈“隐”的时候从“孔孟之隐”和“老庄之隐”切入。

关于王维的隐逸课题，学者陈铁民在《王维新论》的〈谈王维的隐逸〉中按着时序对王维各个人生阶段的心理状态来分析王维的隐逸。金五德和卞慕东在〈如何正确看待王维的隐逸思想〉一文中结合王维的人生经历及儒释道三教

来进行隐逸的分析。学者吴邦江在《儒释道融通与王维显隐之辩》中从儒释道的角度分析王维的隐逸。学者谭朝炎的《王维性情及其隐逸》以性情出发分析王维的隐逸。王维隐逸的比较研究有宁松夫的《孟浩然王维隐逸思想比较》和李丽的《王维与白居易隐逸的差异性》。

综上所述，多数学者都是从诗人的生活经历及各阶段的心灵状态入手来分析隐逸。多数学者偏向从李白对历代隐者的隐逸态度来分析李白的隐逸，王维的隐逸研究则偏向从儒释道入手。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隐逸研究上仍缺乏对诗人心灵旨归的探入，而且到如今还没有学者单独地把王维和李白的隐逸思想进行比较，因此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第五节 研究价值

关于王维和李白的隐逸的课题，各家学者多从性情、人生遭遇、心理变化、思想源流等切入并且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惟这方面的研究多止于对他们隐逸原因及隐逸后的心理状态的探讨，虽有些学者有总结出诗人的仕隐倾向，然尚缺乏对诗人贯穿一生的心灵旨归作深入的探讨。本论文拟在这方面加以发挥。再者，笔者发现王维“居官思隐”和李白“隐而求仕”的现象正好是处于两种仕隐矛盾的极端。而至今还没有学者将王维及李白的这种隐逸现象并列起来谈。笔者认为比较王维和李白的隐逸思想会是探讨心灵旨归很好的切入点，两相辉映必能开掘出不一样的观点。

第二章 隐逸原型与盛唐隐逸风尚

隐逸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中国士人往往对隐逸怀有尊崇之心，隐士不受爵位、隐居终生的高逸情操一直都被人们所津津乐道。对于隐逸生活的赞扬及对隐逸高洁之行的歌颂多次出现在诗歌中并成为历代文人一再书写的主题。史籍诸如《后汉书》、《晋书》、《南史》、《旧唐书》等皆有为隐士立传，记载了他们的事迹风采。根据学者宋锡玲的统计，在被视为正史的二十四史中，就有15部专门设立隐逸传。（宋锡玲，2009，页4）隐逸文化既为一代的人们所推崇，还受到官方的重视，必定有其特殊的价值并与政治脱离不了关系。

第一节 隐逸原型与政治

隐逸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关于隐逸现象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尧、舜、禹三代之际，其中比较著名的隐者为许由及巢父。尽管这只能算是传说中的历史，但毕竟是一种说法。（木斋等，2000，页93）皇甫谧《高士传》记载了许由和巢父的事迹：

尧欲将天下禅让于许由，许由逃到中岳颖水之阳，箕山之下隐居起来。尧又召许由任九州长，许由认为玷污了他的耳朵，于是洗耳于颖水之滨。这时巢父牵着牛犊到河边饮水，见许由洗耳，便问其故。许由回答说：“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我讨厌听到这个，污染了我的耳朵，故而洗耳。”巢父听了说：“你要是躲藏在高岸深谷里，人迹不至，道路不通，谁还能找到你？你到处游荡，就是为了搏取名誉。不要污染了我牛犊的嘴巴。”说罢便牵着牛犊到上流去饮水。（参自皇甫谧，1989，页6）

从这里可以看到早期出现的隐逸其价值取向总是认为政治是肮脏和邪恶的，严重到会玷污耳朵、河水、甚至于牲口的嘴，远离政治则被视为是高洁之举。

到了商末出现了真正作为信使记载的隐者伯夷和叔齐，《史记·伯夷列传》载：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司马迁，2007，页 2123）

伯夷和叔齐的“避位”展现了高洁的品格，他们的“避位”又和许由、巢父的“避位”不同。许由拒绝尧的禅让时说：“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皇甫谧，1989，页 5）许由、巢父所处的时代天下已经大治，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出来为政博取这个虚名。可见他们之所以逃离政治更多是为了维护个人品格的高洁。伯夷、叔齐处于荒淫无道的商纣王时代，孤竹国又是当时商的属国。学者王士立认为伯夷、叔齐避位还有政治原因，说明他们对商纣王的统治不满，不愿与之合作，屈从侍奉，助纣为虐。（王士立，2012，页 49）而后他们听说周文王礼贤下士，就前往投奔，显然伯夷、叔齐的“避位”已经没有许由、巢父那样单纯了。他们不远千里投向西周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可是当他们抵达时，周文王已

经过世，继位的武王主张伐纣，他们反对以武力推翻商政权，极力谏止，武王不纳。最后西周推翻了商朝，伯夷、叔齐以归顺西周为耻，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之，义不食周粟”（司马迁，2007，页 2123），并作《采薇歌》。《采薇歌》其中有一句：“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司马迁，2007，页 2123），这反映了伯夷、叔齐主张以非暴力的途径来达到使天下清平的目的。那么说，是他们的政治理想与武王相抵触他们才选择以归隐作为无声的抗议。

隐逸作为对政治的一种回应未必是抗拒的，有时隐逸甚至是作为从政的一种准备，这种隐逸模式滥觞于辅佐西周推翻殷商的姜太公——吕尚。《史记·齐太公世家》载：

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螭，非虎非熊；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司马迁，2007，页 1477-1478）

姜太公大半生都怀才不遇，一直到年老了仍无所作为。《史记·齐太公世家》另一条资料对此作了补充：“太公博文，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司马迁，2007，页 1478）如此为追求自身理想而汲汲营营的人却会有闲情在渭水之畔垂钓，不能不怀疑他的真正意图。由此可见，他垂钓渭水之畔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包含着政治目的。

纵观上古种种隐逸形态，隐逸和政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正如《遁世与逍遥——中国隐逸简史》的作者何鸣所认为，这些早期的隐士，作为隐士精神的发端，一开始就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纠缠不清的关系。（何鸣，2006，页 5）往后隐逸与政治的联系从未消失，不管到了春秋、秦汉、三国、魏晋、唐

宋一直到元明清，仕与隐的矛盾一直成为困扰士人的难题。因此在界定隐逸的时候可以这样说，隐逸是相对于从政存在的概念。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相对并不代表隐逸与从政是绝对对立的，它只能说是士人行为倾向的两个面向。

第二节 盛唐的隐逸风尚

盛唐是一个积极进取的时代，普遍士人都有着强烈的追求功名心。另一方面，隐逸在此时也蔚为风尚，大多数的士人或官员都有隐逸的经历。可以说，仕进与隐逸心理是共存在盛唐士人身上的。盛唐广开科举取士，打破了魏晋时期政治由世族高门垄断的局面，更多的寒士得以通过科举晋身。士人在政治上看到了开阔的前景，因此渴望参与到国家政权中去施展抱负。这点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为什么处在盛世的士人还会向往隐逸呢？首先是因为盛唐经济的繁荣，为士人隐居山林提供了基本的物资条件，可以衣食无忧。因此，隐逸更多时候成了士人的心灵寄托和生活情趣。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对隐逸之风的盛行起着关键作用。唐朝统治者对隐士格外优渥，这里兹举《新唐书·隐逸传》中统治者礼遇隐士的例子：

田游岩，京兆三原人。永徽时，补太学生。罢归，入太白山。母及妻皆有方外志，与共栖迟山水间。自蜀历荆、楚，爱夷陵青溪，止庐其侧。长史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师，行及汝，辞疾入箕山，居许由祠旁，自号“由东隣”，频召不出。

高宗幸嵩山……亲至其门，游岩野服出拜，仪止谨朴，帝令左右扶止，谓曰：

“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谓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帝曰：“朕得君，

何异汉获四皓乎？”薛元超赞帝曰：“汉欲度嫡立庶，故四人者为出，岂如陛下亲降岩穴邪？”帝悦，因敕游岩将家属乘传赴都，拜崇文馆学士。帝营奉天宫，游岩旧宅直宫左，诏不听毁。天子自书榜其门，曰“隐士田游岩宅”。进太子洗马。……放归山。蚕衣耕食，不交当世，惟与韩法昭、宋之问为方外友云。（欧阳修、宋祁，1975，页 5598-5599）

皇帝为了征召隐士甚至亲自拜访，足见统治者的求贤若渴。可是学者李红霞指出：“事实上，唐朝立国既久，已不再需要借重江湖林野的隐士力量，然而对隐逸之士仍不断予征聘，其用心已转入另一方面：以此显示政治清平、君恩遍泽。”（李红霞，2002，页 8）唐代已经设有完备的科举取士制度，固不须再另征隐士。正如学者吴小龙所说，这只不过是统治者及隐者之间彼此客套和推崇的表演而已。（吴小龙，2005，页 130）以此，隐士既获得了清高的声誉，统治者也达到了笼络人心的目的。既然隐士可以直接被授官职，于是在强烈的功名心驱使下，有的士人开始往隐逸的方向发展。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卢藏用。《大唐新语》记载：

藏用始隐于终南山中，中宗朝累居要职。有道士司马承祯者，睿宗迎至京，将还，藏用指终南山谓之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在远！”承祯徐答曰：“以仆所观，乃仕宦捷径耳。”藏用有惭色。（刘肃，1984，页 157-158）

这就是所谓的“终南捷径”。隐逸居然成了入仕的管道，这是对隐逸本义的一大颠覆。隐逸原来对政治的抗争性没有了。于是隐而后仕，仕而后隐成了唐代

的普遍的现象。仕与隐的矛盾已经淡化了，甚至可以结合起来成为另一种形式——“亦官亦隐”。

第三章 隐逸经历

本章将对王维与李白的隐逸经历做一次梳理，以期勾画出他们隐逸的基本轮廓。

第一节 王维的隐逸经历

关于王维初次隐逸，陈铁民先生在《王维新论》中〈谈王维的隐逸〉一文中说：“王维的首次隐居，大约发生在他擢第后的第七个年头。”（陈铁民，1990，页 125）《旧唐书·王维传》曰：“维开元九年进士擢第”（刘昫等，1975，页 5051）。以此推之，王维的第一次隐逸该发生在开元十六年。按学者陈铁民的说法：“约在开元十六年，诗人即弃官在淇上隐居。”（陈铁民，1990，页 127）先不论有没有“淇上隐居”这回事，关于王维的首次隐居又有另一种说法。这个说法同样是由王铁民先生提出，见于《王维新论》中的〈王维年谱〉。《哭祖六自虚》诗题下注：“时年十八”，学者陈铁民根据诗中“南山俱隐逸”句推断王维在此年以前曾和祖六一起隐于终南。（陈铁民，1990，页 3）学者王辉斌认为王维的初隐非为开元十六年的淇上。（王辉斌，2003，页 19）（王辉斌，2003，页 19）他根据《哭祖六自虚》和《过秦皇墓》诗句下标明的原注，“时年十八”和“时年十五”进一步推导说：“王维与祖自虚的“俱隐”终南山，当在开元四年至五年之间。而此，即为王维的初始之隐。即是说，王维初隐终南山时，其年龄约在十六七岁之际。”（王辉斌，2003，页 19）笔者以为后一种说法较为恰当。《哭祖六自虚》诗中“南山俱隐逸”语乃是王维

对友人的追忆，不可能是胡编乱造。王维于开元三年（715）离家赴长安。（陈铁民，1990，页 2）可知王维的初次隐逸早在他入长安初年就开始了。

《新唐书·王维传》曰：“开元初，擢进士第，调太乐丞。”（欧阳修、宋祁，1975，页 5764）开元九年（721）王维进士及第，被任命为太乐丞。但是不久王维就因为“舞黄狮子”事件“坐累为济州司仓参军”（欧阳修、宋祁，1975，页 5765）。这件事《集异记》转引《太平广记》载：“及为太乐丞，为伶人舞黄狮子，坐出官。黄狮子者，非一人不舞也。”（薛用弱，1980，页 10）开元十四年，王维离济州司仓参军任，却再一次被朝廷外放到淇上去做官。（陈铁民，1990，页 126）一般认为王维在淇上有过短暂的隐居。这样说来，王维于开元十六年的“淇上之隐”当属他的第二次隐居了。学者王辉斌对王维曾隐于淇上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学者陈铁民主要是依据《淇上即事田园》及《偶然作》其三最后两句“忽乎吾将行，宁俟岁云暮”而得出“疑维官淇上之后不久，即弃官在淇上隐居”的推论的。（陈铁民，1990，页 7-8）学者王辉斌认为单以这两首诗无法证明王维曾经隐于淇上。他指出《淇上即事田园》诗中所写，仅为王维“屏居淇水上”之所见，所反映的只是王维在淇上的任职期间，于休沐日在郊外或者淇水边所见之景物描写，而不能表明他斯时乃在淇上隐居。（王辉斌，2003，页 20）他还说《偶然作》其三的“忽乎吾将行，宁俟岁云暮”两句，所表明的是王维当时欲归隐，但欲归隐并不等于已归隐，不能因此认为王维将隐居淇上。（王辉斌，2003，页 20）仅以两首诗中所表现的对隐逸的向往之情就下定论王维曾在淇上弃官隐居有些牵强。笔者以其依据薄弱认为王维在淇上并没有隐居。

王维离开淇上后一直闲居长安。开元二十二年（734）秋，王维赴洛阳献诗张九龄请求汲引，随后隐居嵩山。（陈铁民，1990，页9）此为王维第二次隐逸。次年，王维即被张九龄擢为右拾遗。但是不久在李林甫的打击下，张九龄就遭到贬谪。王维被派遣去出使河西，后又“知南选”至岭南。

开元二十九年（741）春，王维自岭南还长安后，终于决定辞官在终南山隐居¹，有《终南别业》等诗可证。（陈铁民，1990，页128）不过这次的隐居为时不过一年左右，他就复出当了左补阙的官。（陈铁民，1990，页129）《新唐书·王维传》曰：“母丧，毁几不生。服除，累迁给事中”（欧阳修、宋祁，1975，页5765）自此到安史之乱爆发前，除了守母丧期间离朝屏居辋川，王维都不曾退出官场，一直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每在公余闲暇或休假期间归蓝田辋川¹小憩。历任库部员外郎、库部郎中、文部郎中、给事中。（陈铁民，1990，页17-26）

《新唐书·王维传》曰：“安禄山反，玄宗西狩，维为贼得，以药下利，阳瘡。禄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阳，迫为给事中。”（欧阳修、宋祁，1975，页5765）天宝十五年（756），王维陷贼，被迫接受伪职。乾元元年（758）王维被宥复职。（陈铁民，1990，页28）《旧唐书·王维传》称王维被宥后：“责授太子中允。乾元中，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复拜给事中，转尚书右丞。”（刘昫等，1975，页5052）《新唐书·王维传》曰：王维“上元初卒，年六十一”（欧阳修、宋祁，1975，页5765）。按陈铁民先生的《王维年谱》王维于上元二

¹ 学者陈允吉发表《王维‘终南别业’即‘辋川别业’考》一文（载《文学遗产》1985年第一期，以下简称“陈文”），认为“出现在王维诗中的‘终南别业’和‘辋川别业’两个名称，指的是他同一个隐居处所，所谓的‘终南别业’就是蓝田‘辋川别业’。而蓝田县的辋川之外，诗人并没有另一个什么‘终南别业’。”转引自（陈铁民，1990，页46）学者陈铁民认为“陈文”所述的根据只能说明王维诗中的“终南别业”很可能即指“辋川别业”，尚不足以证成“终南别业”就是“辋川别业”。（陈铁民，1990，页47）

年（761）七月逝世。（陈铁民，1990，页 32-33）据王维《谢弟缙新授左散骑常侍状》末句“上元二年五月四日，通议大夫守尚书右丞臣王维状进。”（王维，1997，页 1134）可知王维在其逝世那一年仍官尚书右丞。正如陈铁民先生所言：“自乾元元年春被宥罪复官后一直到逝世，诗人始终没有归隐。”（陈铁民，1990，页 132）

由此可见王维一生中的隐逸是断断续续的而且当官的时间远比隐逸的时间长。王维共经历了四段隐逸，第一段是早年的隐于终南山，第二段隐于嵩山，第三段再隐于终南山以及第四段的隐于官场。

第二节 李白的隐逸经历

李白的隐逸从他在蜀中的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新唐书·李白传》曰：“（白）既长，隐岷山。”（欧阳修、宋祁，1975，页 5762）他亦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自言：“昔与逸人东岩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李白，1980，页 1548）岷山也就是指匡山了。杜甫赠李白《不见》诗云：“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杜甫，1979，页 858），李白亦作有《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及《别匡山》二诗可证。

李白出蜀后四处漫游，游历过洞庭、金陵、扬州、汝海等地。（李白，1980，页 1749）开元十五年（727），李白初到安陆，曾短暂地隐居寿山，时年二十七岁。（安旗，1987，页 27）。《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便是此时的作品。不久李白就娶了许圜师的孙女为妻并定居下来。《上安州裴长史书》云：“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便憩居于此”（李白，1980，页 1545）。他在

《秋于静亭送从侄专游庐山序》中自言：“酒隐安陆，蹉跎十年”（李白，1980，页 1566），可见他在安陆住了将近十年。这期间李白以安陆为中心，一边漫游一边干谒，所到之地包括长安、金陵、襄阳、太原等，但都没有结果。开元二十一年（733），李白就隐于安陆白兆山桃花岩，作有诗《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绾》。（安旗，1987，页 41）但隐居也只维持了一年有余，李白又出游干谒了。（安旗，1987，页 42）

李白比较有据可依的隐逸发生在“安陆十年”后的中年时期。李白将家迁到山东任城，在任城时结识了孔巢父、韩准、裴政等人，常会于徂来山。《新唐书·李白传》载：“更客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来山，日沉饮，号“竹溪六逸”。”（欧阳修、宋祁，1975，页 5762）李白作有《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记此事。在李白入宫前夕曾经有过一次隐居。《旧唐书·李白传》曰：“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刘昫等，1975，页 5053）但从李白的诗文中找不到这次隐居的证据。（斐斐，1981，页 49）

天宝元年（742），李白被玄宗召入宫中。（安旗，1987，页 55）他在《为宋中丞自荐表》中讲述了这段经历：“天宝初，五府交辟，不求闻达。亦由子真谷口，名动京师。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掖”（李白，1980，页 1518）。李白在京不到三年便辞官还山，继续漫游四方。期间曾与元丹丘在河南颍阳、嵩山有过一段隐居生活。（斐斐，1981，页 49）天宝十年（751），李白赴幽州，

欲“拂剑而起，收奇勋于沙漠”²（李白，1980，页 620）。（安旗，1987，页 78）不久，李白发现安禄山在幽州招兵买马是另有图谋，旋即离开。

《新唐书·李白传》曰：“安禄山反，转侧宿松、匡庐间，永王璘辟为府僚佐。”（欧阳修、宋祁，1975，页 5763）安史之乱时，李白避居庐山。永王璘东巡时派人请他下山，李白于是怀着抗敌救国、建功立业的心加入了永王的幕府。一个月不到，永王败亡，李白成了政治犯，下在浔阳狱中，终被流放夜郎。肃宗乾元二年（759），李白在流放途中遇赦。（安旗，1987，页 104、107）这时候李白已经五十九岁，余生在漫游中度过。唐代宗宝应元年（762），李白过世，享年六十二岁。（安旗，1987，页 111）

扣除“长安三年”，还有短暂的“幽州之行”、“入幕永王”的政治生涯，李白的一生都是以在野的身份生活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李白大半生没在当官，都在四处漫游，但并不能就此将“没当官”及隐居等同起来理解。李白的四处漫游往往与干谒求仕紧密相连的。若进行统计，李白的一生中主要断断续续地经历了六段隐居，分别为：早年的匡山之隐、安陆寿山之隐、安陆白兆山桃花岩之隐、徂来山的“竹溪六逸”时期、与吴筠的剡中之隐、以及与元丹丘的河南颖阳、嵩山之隐。

² 《赠何七判官昌浩》

第四章 隐逸生活比较

纵观王维和李白的隐逸经历，王维和李白的隐逸都是断断续续的。然虽则王维几次徘徊于为官与隐居之间，但他的隐逸却不似大半生在野的李白断续得如此频密。且，虽然笔者归纳出了几个李白的隐逸阶段，还不足以概括李白一生的所有隐逸活动。确切的说，笔者所归纳的只是李白几次地点比较固定的栖隐。李白的隐逸始终是模糊的，因为他在大部分不做官的时间里都是在漫游中度过的，期间时而积极仕进，四处干谒；时而又萌生出退隐之思，摆出一副高蹈出世的姿态，游览名山大川、学仙访道。李白不居官的生活是漫游、隐逸、求仕相结合的。因此李白的隐逸行为发生没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是多变、流动性的。王维的隐逸行为则容易辨别得多了，因为他有考取科举和做官这些比较明确的政治活动作为分界线。王维的隐居地点也比较固定，除一段在嵩山外，其他三段隐逸都在终南山。王维的隐逸是偏向静态的。可以如此说，李白之隐“好动”，王维之隐“喜静”。这一动一静中涵盖了怎样的生活方式呢？本节尝试比较王维及李白的隐逸生活来看他们的隐逸志趣。

第一节 内倾与外扬

若要用诗句来概括王维和李白的隐逸生活，王维是“终年无客长闭关，终日无心长自闲。”³（王维，1997，页 203），李白则是“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⁴（李白，1980，页 863）。

³ 《答张五弟》

⁴ 《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旧唐书·王维传》曰：“（维）三十年孤居一室，摒绝尘累”（刘昫等，1975，页 5052）。王维的隐是向内收的，他要把自己藏起来，与世隔绝。这种倾向反映在诗中便是“闭门”、“关门”、“掩扉”之类的词语的频繁出现。

“虽与人境接，闭门成隐居。”⁵（王维，1997，页 55），这“门”是与“人境”即俗世衔接的出口。王维要把这个出口封闭起来，将尘世的喧嚣锁在外面。正如学者尚永亮所言：“闭关之后，砰然一声，一切杂乱纷扰都摒弃于外。”（尚永亮、王凤玲，2004，页 79）不只是藏于屋内，就算在大自然中他还要往里面往深处藏，“返景入深林”⁶（王维，1997，页 417）、“渔歌入浦深”⁷（王维，1997，页 476）、“独坐幽篁里”⁸（王维，1997，页 424），最好不要被人发现“深林人不知”⁹（王维，1997，页 424），他追求这种独处时的自得其乐。所以，王维的隐逸生活总是与世俗的人事疏离“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¹⁰（王维，1997，页 476）、“晚知清净理，日与人群疏。”¹¹（王维，1997，页 521）。无怪乎学者尚永亮说：“读王维的诗，还会觉得他有着强烈的自闭倾向。”（尚永亮、王凤玲，2004，页 78）

李白的隐逸生活则是外放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¹²（李白，1980，页 1241），就如这段诗句的气势恢宏，李白充沛的生命力时时在激荡着，要充溢天地之间。范传正言：“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胜景，终年不移。往来牛斗之间，长江远山，一泉一石，无往而不自得也。”（李白，

⁵ 《济州过赵叟家宴》

⁶ 《鹿柴》

⁷ 《酬张少府》

⁸ 《竹里馆》

⁹ 《竹里馆》

¹⁰ 《酬张少府》

¹¹ 《饭覆釜山僧》

¹² 《望庐山瀑布二首》其二

1980, 页 1781)可见李白之爱好游历。李白一生大半时间都在漫游中度过,到过长安、山东、金陵、太原、襄阳……足迹几乎遍及整个神州大地。范传正评李白说:“(白)脱屣轩冕,肆羈韁锁,因肆性情,大放宇宙间。”(李白, 1980, 页 1781)他就是一匹脱缰的野马,要奔驰,整个大千世界就是他隐逸的寓所。当他萌起隐逸之思时,就地即隐。游庐山瀑布时他说:“而我乐名山,对之心益闲;无论漱琼液,还得洗尘颜。且谐宿所好,永愿辞人间。”¹³(李白, 1980, 页 1239);栖寿山时云:“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¹⁴(李白, 1980, 页 1095);望终南山时叹:“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何当造幽人,灭迹栖绝巘。”¹⁵(李白, 1980, 页 830)。李白的隐绝不拘于一地一处,他要纵横放逸于四海之内。

第二节 恬淡闲逸与放荡不羁

王维乐于沉醉在山水田园的景色中,并且对田园生活怀着无限的向往之情。

从王维的田园诗中可以了解他的生活旨趣所在。

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鸣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¹⁶(王维, 1997, 页 561)

¹³ 《望庐山瀑布二首》其一

¹⁴ 《山中问答》

¹⁵ 《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

¹⁶ 《渭川田家》

田舍有老翁，垂白衡门里。有时农事闲，斗酒呼邻里。喧聒茅檐下，或坐或
复起。短褐不为薄，园葵固足美。动则长子孙，不曾向城市。五帝与三王，古来
称君子。干戈将揖让，毕竟何者是？得意苟为乐，野田安足鄙？且当放怀去，行
行没余齿。¹⁷（王维，1997，页 71-72）

不到东山向一年，归来才及种春天。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优
姿比丘经纶学，伛偻丈人乡里贤。披衣倒屣且相见，相欢语笑衡门前。¹⁸（王维，
1997，页 467）

从这几首诗可见王维向往一个“桃花源”似的理想生存环境，表现出一种远离
世俗喧嚣的生活态度。另一方面，“野老”、“牧童”、“田舍老翁”等人物
的生活在他笔下都是一派闲逸，完全不见农事的辛劳和生计的烦忧，他自己犹
以种田为乐。由此可知，王维追求无忧无虑、闲适及没有世俗牵绊的生活境界。
王维的隐居行为往往体现出文人士大夫的闲雅情致。有时弹琴自娱“独坐幽篁
里，弹琴复长啸”¹⁹（王维，1997，页 424），有时乘舟游景“落日山水好，漾
舟信归风”²⁰（王维，1997，页 460），或静坐观照“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²¹（王维，1997，页 191），或随兴而行“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²²（王维，
1997，页 191）。《旧唐书·王维传》如此记载王维隐居辋川时的生活：“与道
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刘昫等，1975，页 5052）总体而
言，王维的隐逸生活体现出一种闲逸雅致的特质。

¹⁷ 《偶然作》其二

¹⁸ 《辋川别业》

¹⁹ 《竹里馆》

²⁰ 《蓝田山石门精舍》

²¹ 《终南别业》

²² 《终南别业》

李白的隐逸生活除了四处游历，就是酒和妓女这两个元素了。关于李白好饮酒，史传和他朋友的诗文中皆有记载：

更客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日沉饮，号“竹溪六逸”。²³（欧阳修、宋祁，1975，页 5762）

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²⁴（李白，1980，页 1789）

卧必酒瓮，行惟酒船。²⁵（李白，1980，页 1782）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²⁶（杜甫，1979，页 42）

李白诗文中凡关于“酒”的俯拾皆是：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用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²⁷（李白，1980，页 225）

且乐生前一壶酒，何须身后千载名。²⁸（李白，1980，页 242）

傍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鸛鷓勺，鸚鵡杯。百年三万六日，一日须饮三百杯。遥看汗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醱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²⁹（李白，1980，页 473）

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³⁰（李白，1980，页 501）

²³ 《新唐书·李白传》

²⁴ 李阳冰《草堂集序》

²⁵ 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

²⁶ 杜甫《赠李白》

²⁷ 《将进酒》

²⁸ 《行路难》其三

²⁹ 《襄阳歌》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³¹

(李白，1980，页 1269)

可见李白的饮酒都不是浅尝辄止，是“痛饮”，是“沉饮”，是“会须一饮三百杯”“一日须饮三百杯”的豪饮，喝酒没有节制，往往要一醉方休。

李白就算隐逸也不忘带上妓女，他写了不少携妓隐居的诗：

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³² (李白，1980，页 480)

携妓东山上，怅然悲谢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坟荒草寒。³³ (李白，

1980，页 521-522)

安石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楼中见我金陵妓，何以阳台云雨人。³⁴

(李白，1980，页 1501)

千金骏马换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³⁵ (李白，1980，页 473)

诗中屡提谢安，显然李白携妓隐逸主要是受到谢安的影响。《晋书·谢安传》载：

“安虽放情丘壑，然每游赏，必以妓女从。” (房玄龄等，1974，页 2072)谢安是李白仰慕的历史人物之一，隐则高卧东山；出则济苍生，立下不朽的功业。

他很欣赏谢安的作为：

尝高谢太傅，携妓东山门。楚舞醉碧云，吴歌断清猿。暂因苍生起，谈笑安

黎元。余亦爱此人，丹青翼飞翻。³⁶ (李白，1980，页 666-667)

³⁰ 《梁园吟》

³¹ 《客中作》

³² 《江上吟》

³³ 《东山吟》

³⁴ 《出妓金陵子呈卢六四首》其一

³⁵ 《襄阳歌》

魏颢《李翰林集序》曰：“（白）间携昭阳、金陵之妓迹类谢康乐，世号为李东山，骏马美妾，所适二千石郊迎，饮数斗醉，则奴丹砂拂青海波，满堂不乐，白宰酒则乐。”（李白，1980，页 1791）李白携妓隐居是效仿谢安，同时也是他放荡不羁的表现。李白之隐隐得热闹，既纵酒又狎妓，带着浓浓的市井气，正合他自己说的“混游渔商，隐不绝俗”³⁷（李白，1980，页 1535）。

王维爱好恬淡，李白性喜热闹；王维的隐逸带有士大夫的高雅情致，李白的隐逸带着浓浓的市井气；王维追求超尘脱俗的境界，李白则不绝流俗、放浪形骸。两者的隐逸志趣有着很大的差异。

³⁶ 《书情赠蔡舍人雄》

³⁷ 《与贾少公书》

第五章 隐逸原因比较

王维和李白的隐逸原因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以隐待仕”和“现实所迫”。

第一节 以隐待仕

王维初隐终南山时年龄介于十六、七岁，《哭祖六自虚》是他十八岁的作品。诗中有这么一句话：“南山俱隐逸，东洛类神仙”（王维，1997，页 8），前一句告诉了我们王维曾经与祖六一同隐于终南山，后一句指出了他们曾经游洛阳。后一句泄露了一些线索。学者陈铁民《王维年谱》据此指出：“维离家至长安的目的，无非为了谋求进取，其游洛阳，想来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考唐玄宗于开元五年二月至六年十月居洛阳，因此维游洛阳的具体时间，大抵也应在这个期限之内。”（陈铁民，1990，页 3）很明显，王维早年的隐逸是要走“终南捷径”，他与祖六同游洛阳是希望获得玄宗的征聘。当然这一次的隐逸并没成功将王维送入官场。他还是选择了传统的入仕管道——科举来晋身。开元九年，王维进士及第，被任命为太乐丞。王维顺利地步入了仕途，然而半年不到，他就因为“舞黄狮子事件”受到牵连而被贬到地方去当小官，先后在济州、淇上任职。仕途受挫加上长期远离朝廷政治中心使王维渐渐萌生退隐的打算“忽乎吾将行，宁俟岁云暮！”³⁸（王维，1997，页 73）。但是他的用世之志并没有泯灭，他在《不遇咏》说：

北阙献书寝不报，南山种田时不登。百人会中身不预。五侯门前心不能。
身投河朔饮君酒，家在茂陵平安否？且共登山复临水，莫问春风动杨柳。
今人作人多自私，我心不说君应知。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儿一男儿！（王维，1997，页 80）

³⁸ 《偶然作六首》其三

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张九龄拜相，二十二年五月，又加中书令。（陈铁民，1990，页 127）王维看见了可以重新回归朝廷的机会，作《上张令公诗》请求汲引：

贾生非不遇，汲暗自堪殊。学《易》思求我，言诗或起予。尝从大夫后，何惜隶人余。（王维，1997，页 102）

从这里可以看到王维一直都在密切注视着朝廷的人事调动，一旦有适当援引自己的人物掌权，王维便赠诗表明心迹。参自（黎亮，2003，页 25）献过诗之后，王维便隐于嵩山。（陈铁民，1990，页 10）很显然王维这次的隐居是在等待朝廷的任命。至于为何要隐于嵩山，学者陈铁民指出：“盖是时玄宗居东都，而嵩山地近东都，隐此正可待机而仕耳。”（陈铁民，1990，页 11）据《旧唐书·玄宗纪》载二十二年正月玄宗“幸东都”。（刘昫等，1975，页 200）此说颇是。这一次的隐居固然是为了出仕，值得注意的是，嵩山之隐并没有被利用为出仕的手段，在性质上与王维初隐终南是不同的。而且在王维给张九龄的诗中，王维也只是单纯表达了自己对出仕的热情，只字不提自己的隐逸意向，可见他并没有要借隐逸来扬名。他隐居时作有《归嵩山作》：

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荒城临古渡，
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王维，1997，页 108）

此诗写来恬淡适意，可以想见王维隐居嵩山时心情是愉悦的。从这里可以看出王维确实打心里喜爱隐逸生活，所以在等待任命下来的期间他选择隐于洛阳附近的嵩山，一边享受隐逸的乐趣一边潜伏待时。所以王维的待仕之隐有分为两种性质一种是以隐扬名的“终南捷径”式的隐逸，另一种是等待出仕的闲居。

假设我们有机会问李白他的隐逸原因是什么，他的反应大概会是这样，“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³⁹（李白，1980，页 1095）。他不会直接回答，因为内有乾坤。开元十五年（727），二十七岁的李白漫游多地之后来到了安陆这个地方。初来，既隐于安陆寿山。（安旗，1987，页 27）在那里他写下了足以概括他一生出处思想的篇章——《代寿山答孟少府》。他为自己铺设了一幅理想的人生蓝图，也就是“功成身退”：

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乃蚺蟠龟息，遁乎此山。仆尝弄之以绿绮，卧之以碧云，嗽之以琼液，饵之以金砂。既而童颜益春，真气愈茂。将欲倚剑天外，挂弓扶桑，浮游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俄尔李公仰天长吁，谓其友人曰：吾未可去也。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映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此则未可也。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李白，1980，页 1525-1526）

李白的“功成身退”包含了三个阶段：“遁乎此山”——“愿为辅弼”——“浮五湖”，也就是先隐逸，然后出仕干一番大事业，功成之后飘然隐退。表面上看，这个思想表现了一种淡泊名利、不居功自傲的高洁品格。然而李白描述这个人生理想的口吻却丝毫不谦卑，反倒是处处展现出傲岸及自命不凡的姿态，如：“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笔者以为李白想要表达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我的隐逸乃是因为性情使然，品格高贵使然，是心之所向。可是我有过人的才华，这个世界需

³⁹ 《山中问答》

要我的才华，我不能自私地将自己藏起来，所以暂且把小我搁一旁，出来匡济天下社稷。大业已成，我则挥一挥衣袖离开，对功名利禄毫不眷恋，按我的性情继续隐逸。”他将“追求功名”等同于自己身为人才必须承担的义务，隐逸才是他的真正追求。说穿了，李白很明显就是在借隐逸来标榜自己的品格很高，能力很强。学者蓝旭认为李白大谈功成身退，意在自树矫抗之迹。（蓝旭，1997，页 4）因为他常在干谒诗中表达类似的思想：

却秦不受赏，击晋宁为功？小节岂足言？退耕舂陵东。⁴⁰（李白，1980，页 594）

灭虏不言功，飘然陟方壶。唯有安期舄，留之沧海隅。⁴¹（李白，1980，页 762-763）

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⁴²（李白，1980，页 615）

一起真横流，功成复潇洒。⁴³（李白，1980，页 724）

学者斐斐所言甚是，李白表示功成身退的决心是为抬高他的政治身份。（斐斐，1981，页 63）他的目的是吸引有权势的官员举荐他入朝。“功成身退”的“功成”才是李白的侧重点，“身退”要在“功成”的条件下方能达成。所以如果功一直不能成，则这个“身退”就一直被列为“待办事项”。学者蓝旭对“功成”和“身退”的关系有很好的阐释，他指出“身退”的作用是口号，是服务于“功成”的工具。（蓝旭，1997，页 9）“功成身退”之所以可以抬高身价，发挥作用的是“身退”。要如何让这个“身退”具有价值呢？那就要看出仕前的隐逸，所以出仕前得先隐出名声来。李白尤其羡慕历史上由隐逸而一

⁴⁰ 《赠从兄襄阳少府皓》

⁴¹ 《赠张相镐二首》其二

⁴² 《赠韦秘书子春》

⁴³ 《赠常侍御》

举登相的人物，如：诸葛亮、吕尚、谢安、严子陵等。这种功利性在李白的首次隐逸就已初露端倪。

李白早年隐逸的原因，杜甫讲得很清楚：“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⁴⁴（杜甫，1979，页 858）。可见这段时间李白是在努力学习为出仕作准备了。孟浩然也曾有过类似这样的隐居苦学“苦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⁴⁵（孟浩然，2000，页 107）。孟浩然苦学是为了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李白却是一生都没有参加科举的。笔者认为，李白早期的隐逸并不是单纯以学习为目的。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乎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人以有道，并不起。此则白养高忘机，不屈之迹也。”（李白，1980，页 1548）根据王琦注的解释，“有道”是唐代科举考试中的常科。（李白，1980，页 1549）《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有云：“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此岁举之常选也。”（欧阳修、宋祁，1975，页 1159）高适就是通过道举晋身的。《新唐书·高适传》：“举有道科中第是也。”（欧阳修、宋祁，1975，页 4679）可见李白少年隐居时曾经被当地的官员推选参加“有道”科的考试。李白是个功名心极强的人，大半生都在不断地干谒求仕，他大可抓住这次机会应举入仕，可是他却拒绝了。他自言此次隐逸是他“养高忘机，不屈之迹”（李白，1980，页 1548-1549），在给裴长史的自荐书中如此刻意标榜，可见他这次的隐逸还有一个目的，即“制造声誉，曲线求仕”（葛景春，1994，页 62）。开元二十九年，李白参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

⁴⁴ 《不见》

⁴⁵ 《答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

陶沔在徂徕山的隐逸活动，作有《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记其事。诗中有“出山揖牧伯，长啸轻衣簪”（李白，1980，页 981）句。按《李白集校注》的评笺说：“韩、裴、孔等亦非真隐者，观此诗知干谒不遂而又还山耳。”（李白，1980，页 983）可见这一次的隐逸目的是求仕。李白曾与道士吴筠同隐剡中。《旧唐书·李白传》曰：“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筠征赴阙，荐之于朝，与筠俱待诏翰林。”（刘昫等，1975，页 5053）根据这条史料，李白是在吴筠的引荐下入朝的。有说李白的入朝是因为贺知章或玉真公主在朝中推荐。⁴⁶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李白的隐逸在一定意义上发挥了扬名的作用。李阳冰《草堂集序》载唐玄宗见李白时说：“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李白，1980，页 1789）可见李白透过隐逸及干谒的双管齐下终于敲开了大唐天子的大门。当然不是李白一生中所有的隐逸都是出仕的手段，基本上从李白少年时期一直到他被召入京这段时间的隐逸活动都是以出仕为目的的。

比较王维及李白的待仕之隐，李白要比王维处心积虑得多。王维早年虽曾走“终南捷径”企图由隐入仕，但也只此一次，王维的初隐终南山更像是尝鲜，借此体验隐逸生活，被不被朝廷征引还在其次，科举才是王维主要的入仕管道。李白因为不考科举，就只能极力在隐逸上搞名堂，一再以“功成身退”来提高自己的身价，辅以漫游干谒，所以在功利性上要比王维强的多。

⁴⁶ 《新唐书·李白传》曰：“筠被召，故白亦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言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论一篇。”（欧阳修、宋祁，1975，页 5762-5763）魏颢《李翰林集序》曰：“白久居峨眉，与元丹丘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李白，1980，页 1790）

第二节 现实所迫

王维上书张九龄请求汲引之后的一年，既开元二十三年（735），王维被张九龄擢为右拾遗。他作了《献始兴公》：

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坐梁肉，崎岖见王侯。鄙哉匹夫节，布褐将白头！任智诚则短，守仁固其优。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王维，1997，页 112-113）

在诗中王维强调自己善于坚守德行，并且说如果张九龄是出于公议任用自己他会感激不尽，出于偏私并不是他所希望的。这表达了王维的政治立场是与张九龄“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王维，1997，页 112-113）是一致的。笔者认同学者陈铁民的说法：“王维的干谒九龄和九龄的提拔王维，是以两人政治主张的一致为基础的。”（陈铁民，1990，页 72）这时的王维展示出奋发的政治热情。然而好景不长，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张九龄被李林甫中伤，罢知政事，次年，出为荆州刺史。（陈铁民，1990，页 12）王维这时的精神是从高峰掉入谷底，《寄荆州张丞相》说：

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目尽南非鸟，何由寄一言！（王维，1997，页 132）

王维由原来的积极进取变成黯然思退。何以张九龄的离朝对王维会有如此大的打击？这当中的原因要从当时的政局进行分析。张九龄离朝，对于王维固然在政治上失去了靠山，但从更广大的意义上看它标志着玄宗的开明政治到此结束。唐人崔群曰：“臣谓罢张九龄，相李林甫，则治乱固已分矣。”⁴⁷（欧阳修、宋祁，1975，页 5081）张九龄是一代名相，以耿直著称。《资治通鉴》卷二百一

⁴⁷ 《新唐书》卷 165《崔群传》

十四评曰：“张九龄尚直”（司马光，1956，页 6825）。《新唐书·张九龄传》曰：“（九龄）及为相，谔谔有大臣节。当是时，帝在位久，稍殆于政，故九龄议论必极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也。”（欧阳修、宋祁，1975，页 4429）他离开后李林甫独揽大权、排斥异己、举用贪官污吏，朝政日非。大臣们人人自危，纷纷噤若寒蝉以求自保。《新唐书·张九龄传》曰：“朝廷士大夫持禄养恩矣”（欧阳修、宋祁，1975，页 4429）《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评论曰：“九龄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司马光，1956，页 6825）整个朝廷笼罩在黑暗压抑的氛围中，官场上行走尚且要步步为营，更别谈王维要施展他的政治抱负了。以此种种王维自然就想离开官场了。王维接着奉命出使河西，后又“知南选”至岭南。开元二十九年，王维从岭南回到长安后终于决定隐于终南山。显然是政治原因把王维逼向了隐逸这条道路。王维自岭南北归途中作《谒璿上人》说：

少年不足言，识道年已长。事往安可悔？余生幸能养。誓从断荤血，
不复 婴世网。浮名寄缨珮，空性无羁鞅。夙承大导师，焚香此瞻仰。颓然
居一室，覆载纷万象。高柳早莺啼，长廊春雨响。床下阮家屐，窗前筇竹
杖，方将见身云，陋彼示天壤。一心在法要，愿以无生奖。（王维，1997，页
179）

从这首诗可以看见王维当时对政治已经灰心失望，不复思求仕进。他只想要通过学佛摆脱尘网，安养余年。王维这时候的隐逸是为了逃避黑暗的政治。学者陈铁民对王维这时的隐居状态下了很好的注解：“对于李林甫专权时期的政治，诗人没有任何幻想，从这点看来，他是清醒的；但是，对于黑暗政治他又不肯反抗，而企图逃避现实，高蹈出世，这又是消极的。”（陈铁民，1990，页 128）然而，王维隐居终南山为时不到一年就复出当了左补阙的官职，自此展开

了他亦官亦隐的生涯。可见王维仍然是想当官的，然他却是身在朝廷，心在山野。既然选择当官为什么还要隐呢？王维复官时政治环境并没有改善，大权仍掌握在李林甫手中。对于黑暗的政治王维不愿同流合污，又不敢反抗，所以他选择了这种不即不离的生存方式。《赠从弟司马库员外綵》说：

少年识事浅，强学干名利。徒闻跃马年，苦无出人智。即事岂徒言，
累官非不试。既寡随性欢，恐招负时累。清冬见远山，积雪凝苍翠。浩然
出东林，发我遗世意。惠连素清赏，夙语尘外事。欲缓携手期，六年一何
驶！（陈铁民，1990，页 349）

王维的“遗世意”是因为“恐招负时累”而发的，从这里可以窥见王维隐逸的退避心理。在黑暗政治环境中隐逸给王维提供了一个精神寄托的场所。另外《青雀歌》云：

青雀翅羽短，未能远食玉山禾。犹胜黄雀争上下，唧唧空仓复若何？（王维，
1997，页 291）

这首诗表达了王维这一时期对功名的淡泊，显然他这时做官已经没有早期的政治理想了。总的来说不管是隐于终南山还是安史之乱前亦官亦隐，都是为黑暗政治所迫而产生的退避行为。

李白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候当数他在长安任翰林供奉期间。据李阳冰在《草堂集序》的记载玄宗对李白礼遇甚厚甚至降尊迎接：“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李白，1980，页 1789）可见李白当时确实风光了一场。他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还洋洋自得：

汉家天子驰驷马，赤车蜀道迎相如。天门九重谒圣人，龙颜一解四海
春。彤庭左右呼万岁，拜贺明主收沉沦。翰林秉笔回英盼，麟阁峥嵘谁可
见？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龙驹雕镫白玉鞍；象床绮席黄金

盘。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⁴⁸（李白，1980，页 748）

然李白在宫中只待了三年不到就“恳求还山”（欧阳修、宋祁，1975，页 5763）而玄宗亦“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⁴⁹（李白，1980，页 1789）。李白以布衣之身一举而登上翰林供奉一职，这可以算是很大的成就。难道这就是他一再强调的“功成身退”吗？不然，这次的辞官退隐与此无关。他是抱着失望的心情无功而返的。李白之所以会选择隐逸与他政治上的失意有很大的联系。他还在朝廷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隐逸的志向“何当造幽人，灭迹栖岩穴”⁵⁰（李白，1980，页 830）、“功成谢人君，从此一投钓”（李白，1980，页 1398）。在《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院内诸学士》中李白透露了他在官场上的局促：

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笑。（李白，1980，页 1398）

显然当时李白遭到小人谗言诋毁。后来他在《为宋宗丞自荐表》中讲得更清楚：“为贱臣作诡，遂放归山”（李白，1980，页 1519）他作有《鞠歌行》表达了遭谗毁的愤懑，言辞激烈：

玉不自言如桃李，鱼目笑之卞和耻。楚国青蝇何太多？连城白璧遭谗毁。（李白，1980，页 295）

李白运用曲高和寡典故中的《阳春白雪》自比，又将自己比为白玉，将那些专事谗毁的小人比作青蝇，表明了他不愿同流合污的心志。李白任翰林供奉的时候介于天宝元年到天宝三年之间，正是奸相李林甫当政的时候，政治腐朽，而李白又不愿依附权贵，这当是他在官场上遭到排挤的原因。李白一方面要保持人格的独立，不愿屈从权贵和黑暗的势力“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

⁴⁸ 《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

⁴⁹ 李阳冰《草堂集序》

⁵⁰ 《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

开心颜”⁵¹（李白，1980，页 899），一方面又担心自己在险恶的官场中遭到迫害“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⁵²（李白，1980，页 242）于是想要远身避祸辞官归隐了。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李白没有机会施展他的政治抱负。学者胡旭在其论文〈李白居翰林和赐金放还考辨〉中指出李白的自我期许与唐玄宗对他的定位有一定的反差是导致李白最终被赐金放还的原因。（胡旭，2012）李白的理想是像诸葛亮、谢安、姜太公等历史人物一样被帝王征召，然后“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⁵³（李白，1980，页 1526）辅佐君王干一番大事业。前半段的理想他是实现了，唐玄宗确实是看重他，但是是看重他的文学才华，并没有将李白视为足以辅佐社稷的将相之才。唐玄宗倒是时常找李白陪侍游宴，写一些吟风弄月或点缀太平的诗文，《清平调三首》就是例证，偶尔写一些诏书⁵⁴。袁行霈等著《盛唐诗坛研究》说：“李白虽得玄宗召见却未得重用，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是玄宗年老昏聩，宰相嫉贤妒能，二是李白志大才疏，未必真有政治才干。”（袁行霈、丁放，2012，页 203）不论如何，李白在政治上的不得志是事实。李白离朝后作的《古风》其十五反映了他怀才不遇的悲愤：

奈何青云上，弃我如粪土！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李白，1980，页 120）。

李白既不能容于朝廷的政治环境，政治上又不被唐玄宗重用，顿觉留下来没有意思，于是就干脆辞官还山了。李白去朝之后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时候他表现得愤世嫉俗，誓要甩手弃世：

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倚事玉阶。

⁵¹ 《梦游天姥吟留别》

⁵² 《行路难》其三

⁵³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⁵⁴ 李阳冰《草堂集序》：“……潜草诏告，人无知者”（李白，1980，页 1789）

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韩信羞将绦灌比，祢衡耻逐屠沽儿。君不见李北海，
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
将钟鼎疏。⁵⁵（李白，1980，页 1146）

其实李白骨子里始终不能忘怀从政的愿望“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
⁵⁶（李白，1980，页 501），失意中仍不失信心“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
复来⁵⁷”（李白，1980，页 225）。显然李白的隐逸是心有不甘的。

通过分析王维和李白的隐逸原因，可以发现他们不管是主动选择或被迫选
择隐逸都是受政治因素影响的。以隐待仕是为了追求功名和实现政治理想，带
有功利性。现实所迫的隐逸则包含了两大块：一是坚守自身的政治立场，不愿
与黑暗的政治同流合污；二是要远离对自己的发展不利的政治环境，全身远祸。
这样看来，隐逸其实是为了应付政治上的种种而产生的行为。

⁵⁵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⁵⁶ 《梁园吟》

⁵⁷ 《将进酒》

第六章 心灵旨归

王维和李白因为种种原因徘徊于仕与隐之间，究竟他们的心灵旨归为何？本章将从安史之乱后他们的仕隐抉择窥探他们的心灵旨归，并深入探讨影响他们心灵旨归的深层因素。

第一节 世乱后的心灵旨归

王维和李白都曾在安史之乱中“误入歧途”，这无疑是他们人生中一个巨大的污点。从他们安史之乱后所作的人生抉择可以看出他们究竟心归何处。

安史之乱爆发后，王维陷贼，被迫接受伪职。至德二年，唐军收复两都，王维因为有弟弟王缙替他削官赎罪及凭着那首陷贼期间作的《凝碧诗》获得了肃宗的宽宥。王维是幸运的，当时朝廷的判决是凡受伪职的官员皆以六等定罪⁵⁸。王维不但成了例外，而且在不久后就被恢复官位了。虽然王维得以免于刑罚，但他的内心是深感愧疚的，他在《谢除太子中允表》深切地忏悔说：“臣闻食君之禄，死君之难。当逆胡干纪，上皇出宫，臣进不得从，行不能自杀。情虽可察，罪不容诛……”（王维，1997，页1003）。奇怪的是，虽然抱着负疚之心但王维并没有因而引咎辞官，且自复官一直到他过世他始终没有离开过官场。学者陈铁民还指出王维这个时候对隐居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陈铁民，1990，页132）这个说法笔者颇能认同。王维作《送韦大夫京留守》云：“人外遗世虑，空端结暇心。曾是巢许浅，始知尧舜深。”（王维，1997，页506）他这时候居然是对隐居持反对态度的，认为巢由隐居避世是肤浅的，赞扬尧舜为

⁵⁸ 《通鉴》至德二载十二月：“崔器、吕湮上言：‘诸陷贼官，背国从伪，准律皆应处死。’上欲从之，李峴以为……此属皆陛下亲戚或勋旧子孙，今一概以叛法处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群臣陷贼者尚多，若宽之，足开自新之路；若尽诛，是坚其附贼之心也。……争之累日，上从峴议，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于市，次赐自尽，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贬。”（司马光，1956，页7049）

苍生操劳识见深远。不仅如此，这时候的王维还劝人出来做官。他在《与魏居士书》中明确表明了他对隐逸的态度。文中他盛赞魏居士德行兼备“造次不违于仁，举止必由于道，高世之德，欲盖而彰”（王维，1997，页1089），认为正当朝廷用人之际“圣主搜扬仄陋”（王维，1997，页1089）魏居士不该“怀宝迷邦”（王维，1997，页1089）怀藏其才而不用，且入仕正好可以帮助改善他家里窘迫的经济状况，没必要“爱身贱物”（王维，1997，页1089）。他在文中对历史上著名的隐士许由、嵇康及陶渊明都予以批评。他评许由“尚不能至于旷士，岂入道者之门欤！”（王维，1997，页1089），指责陶渊明隐逸以致家贫需要乞讨为“忘大守小”（王维，1997，页1089）。这显然与他在辋川时热爱隐逸，不求仕进的态度是相背的。王维这时的思想面貌是积极入仕的。前面已经说过“伪职”事件确时是对王维打击很大，但却没有让王维就此变得消极。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个事件反而是导致王维此时积极入仕的因素之一。且看《谢除太子中允表》：

今圣泽含弘，天波昭洗，朝容罪人食禄，必招屈法之嫌，臣得奉佛报恩，自宽不死之痛。（王维，1997，页1004）

可见王维因为对君主感恩戴德，也是为了消解“伪职”事件的隐痛，越加潜心学佛。《旧唐书·王维传》曰：“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刘昫等，1975，页5052）或许因为这个缘故，他学佛日有所成，并且借助佛理开脱了他的仕隐矛盾。了解王维这一个时期隐逸思想变化的原因有助于发掘他贯穿一生的心灵旨归。笔者认为王维这时的思想变化还受两个因素影响。第一是安史之乱还没有平定，诗人认为应该为国效力，而不应弃世隐居。（陈铁民，1990，页133）《谢除太子中允表》：“况臣夙有诚愿，伏愿陛下中兴，逆贼殄

灭，臣即出家修道，极其精勤，庶禘万一。”（王维，1997，页 1003）；第二是新的政治环境。安史之乱前，盛唐朝政先后被奸相李林甫、杨国忠所左右，政治黑暗，王维无法施展其政治抱负，只能通过亦官亦隐来回避现实。安史之乱后，朝廷少了李林甫、杨国忠这两名奸相，王维不必担惊受怕，且以唐肃宗对王维“伪职”事件的宽容态度以及王维的屡遭升迁⁵⁹来看，可见王维是受到唐肃宗的赏识的。王维把握住了这次的机会，一方面也是因为年岁已大“自怜黄发暮，一倍惜年华”（王维，1997，页 492），想要有所作为之心愈切。综上所述，王维心灵旨归已经明朗化了，王维之前的几次隐逸及亦官亦隐看似消极其实潜藏着一定的积极性，而这个积极性在安史之乱后终于找到了显露的机会。王维的心由始至终都是向着“出仕”的，隐逸只是权宜之计。

安史之乱爆发后次年，隐居庐山的李白在永王璘的征召下慨然投笔从戎，加入了永王的军队。他本以为建功立业的时机来临，怀着“誓要清幽燕”⁶⁰（李白，1980，页 712）的雄心壮志，要学谢安“为君谈笑静呼沙”⁶¹（李白，1980，页 547）。不料李白在永王幕中不到一个月，永王就被肃宗指为谋逆，并派兵围剿，永王败亡，李白也以“从逆”的罪名下浔阳狱。一心要报国平叛反被冠上“从逆”的罪名，他心中的冤屈自不必说。他在狱中悲愤万分地写下了《万愤词投魏郎中》，诗云：

一门骨肉散百草，遇难不复相提携。树榛拔桂，囚鸾宠鸡。舜昔授禹，伯成

耕犁。德自此衰，吾将安栖？好我者恤我，不好我者何忍临危而相挤？子胥鸱夷，

彭越醢醢。自古豪烈，胡为此繫。（李白，1980，页 1410）

⁵⁹ 《旧唐书》曰：“贵受太子中允。乾元中，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复拜给事中，转尚书右丞。”（刘昫等，1975，页 5052）

⁶⁰ 《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

⁶¹ 《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二

李白终因“从璘”被流放夜郎。乾元二年，李白在流放途中遇赦放还。（安旗，1987，页 104、107）李白返回江陵，这时候他已经五十九岁了。李白为自己老来仍旧一事无成感到沉痛至极：“叹我万里游，飘摇三十春；空谈帝王略，紫绶不挂身。”⁶²（李白，1980，页 347），于是他借助游仙和痛饮狂歌来消解心灵的痛苦。

三载夜郎还，于兹炼金骨。⁶³（李白，1980，页 1367）

不然鸣笳按鼓戏沧流，呼取江南女儿歌棹讴。我且为君搥碎黄鹤楼，君亦为

我倒却鸚鵡洲。赤壁争雄如梦里，且须歌舞宽离忧。⁶⁴（李白，1980，页 745）

李白的用世之志并没有消灭，还四处漫游请求引荐。他仍然时时关注着国事，“拂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⁶⁵（李白，1980，页 728）“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⁶⁶（李白，1980，页 758）。李光弼出镇临淮要与史朝义决战的时候，六十一岁的李白还想请缨加入李光弼的幕下，因病才半途而还。他作有《闻李尉大举秦兵为募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次年他就病故了。“永王”事件并没有打击李白继续求仕的愿望。可以说，功名是李白终其一生都在执着追求的。

安史之乱为王维和李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王维因为接受了“伪职”晚年一直活在愧疚当中，李白则因为从逆的罪名后半生落魄潦倒。不过也正是安史之乱的打击让王维及李白原本模糊的心灵旨归明朗化了。即使遭到了巨大的挫折，他们最终选择的是出仕而不是消极避世。如此，王维居官而思隐，李白隐

⁶² 《门有车马客行》

⁶³ 《忆秋浦桃花旧游时窜夜郎》

⁶⁴ 《江夏赠韦南陵冰》

⁶⁵ 《赠张相镐二首》

⁶⁶ 《经乱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江夏韦太守良宰》

而求仕的矛盾现象就有了合理的解释，他们的隐其实都是在潜伏等待一个可以施展政治抱负的契机，即以退为进。

第二节 儒与释道

王维被称作“诗佛”，李白被称作“诗仙”，但不能就此以单一的“佛教”或“道教”思想来概括他们的隐逸思想。处在唐代儒、释、道三教并流的环境之下，王维和李白的隐逸思想呈现出三教交融的现象。王维和李白都是以“仕”作为他们的心灵旨归，很显然他们是以积极用世的儒家思想作为根本的出处原则的。在此基础上，他们分别根据自身的需求和理解接受佛教、道教来调和他们的隐逸思想。王维偏重佛，李白偏重道。

一般在谈王维的隐逸思想时都会强调禅学对他的影响。其实儒家思想才是王维思想中的主流。从他早年的诗作中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儒家思想痕迹，以《少年行四首》为例：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

汉家君臣欢宴终，高议云台论战功。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配出明光宫。

(王维，1997，页 33-36)

这四首诗讲述了一个任侠的少年成长为一名将军的故事。这可以说是王维人生理想的反映。少年再如何放荡不羁都好，最终都是要靠出仕寻出路，为国家建

功立业然后取得功名。可见早年的王维是充满用世的抱负的。此外，王维几次想隐逸最终都以出仕作为结束，这表明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在他身上发挥了作用。王维少年时隐于终南山及后来隐于嵩山毫无消极避世之意，而是以隐求仕，展现了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张九龄罢相后，李林甫独揽大权，政治日趋黑暗。王维无力改变时局，又不愿同流合污，在官场上唯有亦官亦隐。这时他遵循的其实还是儒家那套出处原则“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朱熹，2012，页 150）。国家有道的时候言行要正直，国家无道的时候行为持正但言语则随和谨慎以免遭受祸害。“亦官亦隐”这种生存形式是儒学与禅学调和的产物。从王维晚年所写的《与魏居士书》可以看见王维儒学与禅学的灵活融通：

孔宣父云：“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可者适意，不可者不适意

也。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

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王维，1997，页 1095-1096）

王维运用禅理中的不二精神，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云：“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简丰文，2001，页 86），《坛经·机缘品》云：“于相离相，于空离空”（惠能，2008，页 39）来解读孔子“无可无不可”的儒家精神。学者王志清说：“孔子原本的意思是，只要为社会尽了责而成败荣辱在所不计。经王维‘天才的误读’，其内涵转换为：无论道之行或不行，照样可以适意，只要随顺真如。但前提必须是‘身心相离，理事俱如’。”（王志清，2008，页 22）王维通过禅理化解了仕与隐的界限，在心理上做到不执著于仕亦不执著于隐；处在社会关系中的“身”则可以在没有牵累之下履行“布仁施义，活国济人”（王维，1997，页 1096）的义务。这就是王维亦官亦

隐的哲学依据。王维将“济世救人”视为必须承担的义务，这又是他儒家思想的反映。因此他反对避世隐居，他说：“圣人知身不足有也，故曰欲洁其身而乱大伦”（王维，1997，页 1095），就是说不要执着于个人的角色，为了维护个人的高洁而避世隐居是乱了君臣之义。《论语·微子》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朱熹，2012，页 186）王维很强调君臣之义。显然在立身出处纲常伦理这一方面王维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本的，佛教禅理则是起着调节及平衡心灵的作用。因此佛学对王维的影响并非消极的。

《旧唐书·李白传》曰：“（白）飘然有超世之心”（刘昫等，1975，页 5053）。贺知章称李白为“天上谪仙人”（刘昫等，1975，页 5053）。司马承祯也说李白有“仙风道骨”⁶⁷（李白，1980，页 1）。这些说法反映的固然是李白飘逸的人格特质，也反映了李白深受道教和道家的影响。首先得提一提的是，李白崇道与政治因素有一定的联系。唐朝历代君主除了武则天崇佛以外，都是崇道的，尤以唐玄宗佞道最甚。李白积极参与道教活动除了是受世风影响，当与他入仕的愿望有关。学者葛景春说：“他的目标并不在于道教，而是想通过道教的关系网，打开一条通向朝廷的道路。”（葛景春，1994，页 62）他后来之所以能够被唐玄宗召入宫中与道士元丹丘、吴筠和玉真公主的引荐不无关系。魏颢《李翰林集序》曰：“白久居峨眉，与丹丘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李白，1980，页 1790）持盈法师既是玉真公主。《旧唐书·李白传》曰：“（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筠征赴阙，荐之于朝，与筠俱待诏翰林。”（刘昫等，1975，页 5053）显然李白的崇道包含着目的性，他未曾

⁶⁷ 《大鹏赋》序

偏离儒家以“济世”为追求的轨道。道教所讲的是长生久视、神仙方术。若说道教对李白隐逸思想的影响，就是赋予了他一个超脱一切束缚的神仙幻想。李白毕竟是相信通过方术是可以修炼成仙的，从他诗中的内容可以看到他曾采药、炼丹、还练过食气餐霞之类的内丹功夫：

吾营紫河车，千载落风尘。药物秘海岳，采铅青溪滨。⁶⁸

(李白，1980，页100)

闭剑琉璃匣，炼丹紫翠房。⁶⁹ (李白，1980，页904)

我昔东海上，崂山餐紫霞。⁷⁰ (李白，1980，页843)

道教的确含有出世离俗的内容，但它毕竟不是将李白导向隐逸一途的因素。李白之所以辞官隐逸是因为他在黑暗的政治环境中无法施展政治抱负，他又不想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因此在无奈之下才选择了隐逸。这还是受到儒家出处原则的影响，“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2012，页77）。在政治失意的时候，道教的神仙幻想无疑成了李白最好的心灵寄托。至于道家，李白汲取了老子的“功遂身退”⁷¹（王弼注；楼宇烈释，2008，页21）“功成而弗居”⁷²（王弼注；楼宇烈释，2008，页6）结合以儒家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2012，页359）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功成身退”思想。既包含了儒家的积极入世，又包含了道家的遗世独立。终究李白的用世心太强，没能很好地调儒家与道家的思想，从来没有安心地归隐。就算是游于神仙幻境，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现实：

⁶⁸ 《古风》其四

⁶⁹ 《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

⁷⁰ 《寄王屋山人孟大融》

⁷¹ 《老子·九章》

⁷² 《老子·二章》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纓。⁷³（李白，1980，页 129-130）

神仙道教到了李白晚年甚至已经无助于消解他仕途失意的痛苦：

富贵与神仙，蹉跎成两失。⁷⁴（李白，1980，页 460）

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⁷⁵（李白，1980，页 1375）

李白始终未能达成他“济苍生”的理想，但他至死还在执着，他写下了最后的《临路歌》⁷⁶：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事，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李白，1980，页 582）

他的临终歌很清楚地显露了李白骨子里就是一个儒家，他用坎坷的一生实践了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2012，页 159）的坚韧精神。

王维和李白隐逸思想的底色还是儒家，佛与道只是作为补充，起着心灵调节的作用。王维成功地调和了儒与佛的思想，并化解了仕与隐的界限，实现亦官亦隐的境界。李白在思想的调和上是失败了，不但出仕不成，道教和道家思想又无法帮助他从失意的痛苦中超脱出来。

⁷³ 《古风》其十九

⁷⁴ 《长歌行》

⁷⁵ 《拟古》其三

⁷⁶ 王云：按李华墓志谓太白赋临终歌而卒。恐此诗即是，路字盖终字之伪也。（李白，1980，页 583）

结论

王维居官而思隐，李白隐而求仕的现象并不矛盾，这只是表象而已。探究他们的隐逸原因，无论是主动选择或者被迫选择的隐逸都无可避免地与功名挂钩。隐逸对于他们来说更像是一种应对政治得失的周旋方式。安史之乱后王维和李白在仕隐上的抉择透露了他们的心灵旨归明显是指向“出仕”。曾经背负着叛国罪两个人最终并没有走向消极厌世，王维继续留在官场，李白仍积极地求仕，这足以说明王维及李白早前的隐逸都只是碍于时局的权宜之计。因此，虽然王维崇拜佛教，李白崇尚道教，主导着他们立身出处的还是儒家。虽然佛教与道家皆有离世脱俗的倾向，却没有将他们导向消极避世。对于王维和李白来说佛教和道教的作用在于调节内心的平衡。王维将佛教的禅理运用在儒家思想上，化解了仕与隐的界限，实现了亦官亦隐的境界。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得到很好的调和。李白的崇仰神仙道教终究没能帮助他从政治失意的痛苦中超脱出来。盛唐士人积极向上及好功名的精神在他们身上都一一体现了，正合了王维的话“圣代无隐者”（王维，1997，页 27），在那个生机勃勃的时代能有多少人是安于隐居的呢？

参考文献

第一节 引用书目

一、古籍

1. 杜甫(1979), 《杜诗详注》(仇兆鳌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 房玄龄等(1974), 《晋书》, 北京: 中华书局。
3. 皇甫谧(1989), 《高士传》, 《四部备要·史部》(第四六册)。北京: 中华书局。
4. 惠能(2008),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5. 简丰文(2001),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集注》, 台北: 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
6. 李白(1980), 《李白集校注》(瞿蜕元、朱金成校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7. 孟浩然(2000), 《孟浩然诗集笺注》(佟培基笺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8. 刘肃(1984), 《大唐新语》(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北京: 中华出版社。
9. 刘昫等(1975), 《旧唐书》, 全十六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0. 欧阳修、宋祁(1975), 《新唐书》, 全二十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1. 司马光. (1956), 《资治通鉴》(胡三省音注), 全二十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2. 司马迁(2007), 《史记》, 第二版, 北京: 中华书局。
13. 王弼注; 楼宇烈释(2008), 《老子道德经注校释》, 北京: 中华书局。
14. 王维(1997), 《王维集校注》, 四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5. 薛用弱(1980), 《集异记》, 《古小说丛刊》, 北京: 中华书局。
16. 朱熹(2012), 《四书章句集注·孟子》, 北京: 中华书局。
17. 朱熹(2012), 《四书章句集注·论语》, 北京: 中华书局。

二、专书

1. 安旗(1987), 《李白年谱》, 台北: 文津出版社。
2. 陈铁民(1990), 《王维新论》, 北京: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3. 斐斐(1981), 《李白十论》, 四川: 四川人民出版社。
4. 何鸣(2006), 《遁世与逍遥: 中国隐逸简史》,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5. 木斋等(2000), 《中国古代诗人的仕隐情结》, 北京: 京华出版社。
6. 王志清(2008), 《纵横论王维》, 济南: 齐鲁书社。
7. 吴小龙(2005), 《适情人性的审美人生·隐逸文化与休闲》,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8. 袁行霈、丁放(2012), 《盛唐诗坛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二节 学术论文

一、学位论文

1. 李红霞(2002), 《唐代隐逸风尚与诗歌研究》, 博士论文, 陕西: 陕西师范大学。
2. 宋锡玲(2009), 《中国古代正史隐逸传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陕西: 陕西师范大学。

二、专书论文

1. 蓝旭(1997), 〈论李白的功成身退思想〉, 郁贤浩编, 《中国李白研究》(1995-1996年集)(页1-14), 安徽: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三、期刊论文

1. 葛景春(1994), 〈李白与唐代的隐逸之风〉, 《天府新论》, 1994年第6期, 页61-66。
2. 黎亮(2003), 〈王维隐逸的心路历程〉, 《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年第3期, 页24-27。
3. 尚永亮、王凤玲(2004), 〈王维、孟浩然“隐”、“逸”之辨〉, 《江汉论坛》, 2004年第8期, 页78-81。
4. 王辉斌(2003), 〈关于王维的隐居问题〉,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03年第6期, 页19-22。

5. 王士立(2012年11月),〈伯夷、叔齐评说〉,《历史学研究》,页48-52。

四、网络论文

1. 胡旭(2012年2月27日),〈李白居翰林及赐金放还考辨〉,检索日期:2014年3月23日,来源: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http://chinese.xmu.edu.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312>
6。